

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可能影響

趙永茂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緒論

一九八四年五月，英國宣布將放棄對香港的主權和治權，隨後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並承諾中共在收回香港後，將維持當地的政經制度五十年不變。同年九月底，中共和英國簽訂聯合聲明。聲明第一款載明，中共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對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在內的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中共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並於一九九〇年四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質言之，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香港地區即將由原來英國殖民地地位，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這些改變勢將對爾後香港、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產生很大的影響與衝擊。

美國學者Scalapino談到美國與亞洲的關係時，認為後冷戰時期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興起，正受到其他兩股勢力的制約，即地方主義(localism)與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而這三種力量的交錯制約與發展，將對未來世界起主導作用^①。這些理論再加上中央主義(centralism)理論似乎亦可用來解釋未來香港與中共，乃至香港、中共與台灣間的互動關係。香港九七之後，在中共民族主義或中國化、內地化的大旗之下，其政經體制與走向，仍必須在政治與政權安定重於一切的原則下，由中共中央監控及約制其運作。可是另一方面，它又必須利用其特殊的國際地位援引國際的支持與同情，促進其自身及珠江口地區、華南地區，甚至大陸與台灣之間經濟、貿易發展的中介角色。此外，它還必須謹慎處理九七之後許多港人要求自治、民主的聲浪，亦即來自地方主義、要求擴大一國兩制及自治範疇的本土化或民主化的反彈壓力^②。尤其香港在九七之後，還必須背負一個吃重的「一國兩制」的樣板，在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文化上，扮演一個被利用來對台灣進行「一國兩制」、「祖國統一」的統戰中介角色。此一角色對未來香港與台灣之間的政經社會等關係，乃至海峽兩岸間的關係，將投下更多複雜而不易確定的變數，影響兩岸三地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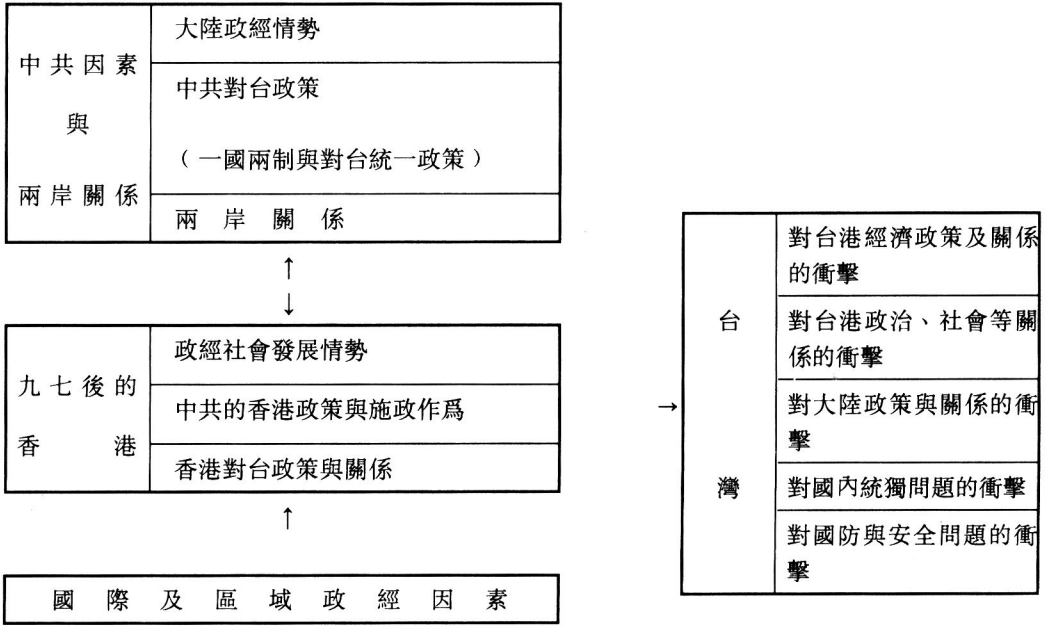
註① Robert A. Scalapin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s." *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 1 (Fall), pp.22~23.

註② 蕭金政，「1997前從香港在兩岸政經關係中的角色」，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政經形勢與台灣關係(下)，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十三—一~頁十三—十四，並請參閱丁偉「轉變中的香港政治秩序及對臺港關係的啟示」，問題與研究，第三一卷，第九期，及一~三。

，並對台灣政經社會產生若干深遠的影響。

然而就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衝擊面而言，由於牽連的變數頗多，如本文圖一有關

圖一、一九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可能衝擊分析系絡



「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可能衝擊分析系絡」所示，基本上影響九七後香港衝擊台灣的諸因素中，大致可分為來自香港本身的因素：如香港的政經發展情勢，中共的香港政策與施政作為，以及香港的對台政策與關係。整體而言，香港本身的因素端視中共對香港政經等統治政策的成敗，及因此所造成香港政經社會的反應與反彈，以及在中共中央主導之下，香港的對台政策與關係。其中影響台灣較大的部分，則關係到中共如何透過港澳的「一國兩制」樣板，進行對台統戰。

但正如圖一所示，九七之後，在上述香港對台灣的影響因素中，尚會受到國際及區域政經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美、英、日等大國對中共九七的香港政策與施政的反應，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區域政經與外交、安全等因素之影響。此外，如圖一所示，雖然九七之後香港和大陸有其一致的地方，就是同樣希望「一國兩制」在香港得以成功。香港人心中所想的是實行高度自治，排除任何中方的干預，讓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得以保持；大陸則希望能成功取回香港的主權，並把任何可能威脅到中國大陸有效管制的勢力除去。換言之，香港希望在「兩制」下仍然保持原有制度的特色，大陸則強調「一國」的原則，要求主權體現凌駕於特區自由的保障^③。因此，在九七後

註^③ 翁松然，「九七與中、台、港關係」，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政經形勢與台灣關係（下），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十二一二。

香港本身衝擊台灣的因素之上，尚有一中共的因素存在，其主要的影響變數則包括中國大陸後鄧時期的政經情勢、中共的對台政策，亦即在港澳一國兩制前提下的對台統戰，以及兩岸關係的互動情況等因素，均將在未來九七後香港衝擊台灣的諸因素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以上部分，將在本文第二、三節中進一步分析。

而就九七後香港衝擊台灣的層面而言，亦如圖一所示，包括台灣可能面臨對台港政、經、社會政策與關係的衝擊；對大陸政策與關係的衝擊；對國內統獨問題的衝擊，以及對台灣國防與安全上的可能衝擊等，本文亦在第四節中詳加分析。綜合而言，九七之後，香港即將成為兩岸在「一國兩制統一政策」與「兩政治實體，一國兩府三區」之間，政經統合矛盾與攻防賽局中的新角力場^④。其互動關係，雖然具有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但對台海兩岸未來的發展卻具有深遠的意義，值得進一步觀察與探索。尤其台灣方面宜作更有體系的研究，以作為擬訂回應策略的參考。此亦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希望經由這些研究，能夠引起更多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與因應策略的擬訂。

二、九七後香港的政經情勢與對台關係

(一)九七後香港的政經社會發展與中共的對港政策

香港自從一八四一年被英國強占之後即被宣布為自由港，在英國殖民地初期自由港與自由貿易經濟政策之下，香港的轉口貿易因此得以迅速發展，並因而帶動例如航運、船務、港口、碼頭、貨倉、保險、銀行、郵電通訊等行業的發展，奠定其經濟發展的基礎。二次大戰之後，香港仍以轉口貿易為主，即使其製造業亦都以為轉口而加工的小型工廠為主。尤其一九五〇年後，來自上海、天津等地避難的勞力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成衣業等蓬勃興起，他們利用逃難的大量人力與資金，和戰後國際經濟重新再分工的機會，促使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力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到一九五〇年代末，其製造業產品出口所占全港出口總值的比率已達七成；到六〇年代，其他電子、玩具、鞋類等勞力密集產業亦快速成長，而使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⑤。

香港的自由經濟政策，使其與國際分工和國際景氣循環緊密相連。七〇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曾使其於一九七三年股票市場崩盤，而被迫進行產業調整，並進一步發展金融、旅遊及房地產等業。隨著八〇年代初以來亞太經濟的抬頭，以及一九七九年後中共的改革開放，香港的金融、旅遊、轉口貿易等中介性服務業和房地產、外匯、黃金等投機性行業，便都成為香港最重要的經濟部門。香港這種中介型或掮客型經濟的特性，表現在經濟文化上的，就跟「難民心態」一樣，可以和威權的殖民統治及其「積極不干預主義」並容，何況威權政府還對各種大「掮客」和「投機者」提供非官方議員、諮詢委員、顧問及太平紳士等頭銜與權益。這類型島域及半島域經濟文化也

註④ 張五岳，「香港的一九九七對於我大陸政策及港澳政策之影響」，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政經形勢與台灣關係（下），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十四—一～十四—二九。

註⑤ 蕭全政：同註②，頁十三—六～十三—七。

促成極端個人主義的發展，使得香港人普遍強調物質性、及個人功利性的生活與成就^⑥。並因而鑄造出一種兼具妥協、投機與勤勞的政治經濟性格。此外，在過去一百多年中，香港已發展成爲世界著名的商業城市與港口，而且已成爲僅次於倫敦、紐約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人常以此自豪。此一成就都應歸功於英國殖民政府成功的在香港發展出一種「行政吸納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的模式，使香港得以建立一個廉能有效並講求法治的政府與社會，並對香港的政治安定發揮極重要的作用^⑦。香港人民與社會這些政治經濟性格與屬性，在九七中共接收統治之後，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與衝擊。

就九七後香港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而言，如前節所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共在與英國簽署的聯合聲明中，承諾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維持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五十年不變。一九九〇年四月，中共宣布經人大審議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授權香港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二條)，且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五條)。這對九七後香港政經社會的穩定，應有幫助。此外在經濟方面，並規定「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港元爲特別行政區貨幣，繼續流通」，並允許香港「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地位」、「繼續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第五章)。九七後這些法制規範對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保障。

何況基本上，在政策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香港對中國大陸是有利的。爲此，香港人似乎爲他們的政經未來看到一條出路：他們已準備開始學習如何在中國共產黨開放政策與「四個堅持」的夾縫中生存。並逐漸摸索出兩條道理，一是肯定中共統治的絕對威權的同時，儘量利用開放政策的機會與廣東省融爲一體；二是把這個「華南經濟圈」或「大香港經濟圈」帶到世界去，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使國際市場力量和華南經濟圈掛鉤，直接影響華南地區數以千萬人的生計。並以香港的國際化帶動整個珠江三角洲的國際化，使後者的國際化與現代化反過來成爲香港政經前途的「後山屏障」^⑧。這種情勢就如同前節所述的，使香港處在一種民族主義、地方主義與國際主義矛盾交戰的情境，換句話說，使香港成爲中國大陸共產政權「和平演變」的前哨站，使中國大陸沿海，甚至內陸經濟特區，也能逐漸燒起「一國兩制」的進化之火，逐漸演化中共中央與地方的威權統治結構。

然而，就香港的政治發展而言，正如前節所述，香港仍然必須在中共兩個政治框架下運作：(一)雖然香港人民希望在「兩制」原則下能保持原有生活與制度的特色，但是中共則強調「一國」的原則，而要求主權體現凌駕於香港特區自由的保障。換言之，香港的經濟自由、政治的自治，甚至民主化、地方化，危害了「國家」的利益或威脅到共產黨政權的穩定時，隨時可能面臨被干預的命運。(二)九七後香港必須背負吃重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邢慕寰、金耀基，*香港之發展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三。

註⑧ 丁偉：同註②，頁二。

的「一國兩制」、「祖國統一」的對台統戰的任務。為實踐此一目標，香港許多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文化活動與資源，將被一定程度的干預與扭曲，被迫配合中央強化對台灣的政經社會進行統戰工作。

此外，九七之後，雖然基本法上明文規定現行體制不變，但中共將可透過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修改權、對特別行政區之立法發回重議或撤銷權，對行政長官之任命、指令和監督權及對主要官員的任免權等方式^⑨干預其政治、或經濟社會政策方向。特別是擁有龐大政治與經濟力量的中資公司與中央駐港機構人員，將隨時會配合中央介入干預香港的政治、經濟等事務。有關此一問題，由最近中共片面宣布九七後將成立臨時立法會，其理由是九五年選出的立法會不能直通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的例子，可見中共對香港的民主、自治，亦即一國兩制的實施，仍有相當大的干預權。因此以中共在走向經濟開放的初期，所呈現在政治與行政上的貪污、腐化，社會安全與秩序惡化以及特權橫行的情況而論，九七之後即使在「港人治港」的原則之下，其講求行政效率與法治以及呈現秩序與安全的社會特質，將可能遭受嚴重的腐蝕與衰敗。同時可以預料的，對贏得最近兩次選舉的香港民主黨等主張香港應有更多民主與自治空間的人而言，在可見的未來將會遭遇到不少的挫折。尤其在港人的妥協、仲介、個人主義與需求安定的國際化經濟性格之下，其政治的民主化或地方化的發展前景，必然是十分艱苦。

(二)九七後香港的對台政策與關係

二次大戰，香港做為台海兩岸的政經中介角色，即使在一九七〇年代末之前，在東西對立與兩岸對抗關係之下，香港也只扮演非常有限的中介角色；然而，隨著中共開放政策的推動及東西對立關係的改變，兩岸間政治與意識形態上對抗的緩和，以及因兩岸無法直接通商通航的限制，反而在短期之內促使香港扮演非常重要的兩岸經貿中介角色。面對未來，香港在兩岸間的中介角色，除受香港中國化、民主化與國際化等因素影響外，還受中共本身的改革開放進程及台海兩岸政經互動關係的制約^⑩。

由表一顯示，大陸改革開放後海峽兩岸商品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已由一九七九年的七千七百八十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八十六億八千九百萬美元，增加將近一一二倍。並且一九八七年後每年仍以顯著的百分比在增長中，而且以自台灣轉口進入大陸所占比例較高。可見迄至目前為止，香港與台海兩岸間的經濟關係有日漸增強的趨勢。此外，迄一九九三年底，香港進口台灣產品總金額已高達一百二十億四千七百萬美元，使台灣繼續成為香港第三大進口產品供應區，僅次於中國大陸及日本，同時台灣亦是香港第七大產品外銷市場。此外，又如觀光業是香港賺取鉅額外匯的第三大重要行業，而台灣民眾訪港人數高居香港外地遊客的首位，且消費力強，已足以影響香港觀光業的榮枯。可見香港與台灣的經濟關係已十分密切。

註⑨ 翁松燃，「香港經驗：中英談判與特別行政區制定過程之啟示」，輯於《香港經驗對台灣的意義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一年，頁二六。

註⑩ 蕭全政：同註②，頁一三—一。

表一 海峽兩岸商品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統計表

單位：百萬美元

年 度	台灣經香 港至大陸 (1)	成 長 率 (%)	大陸經香 港至台灣 (2)	成 長 率 (%)	總 額 (1)+(2)	成 長 率 (%)
1979	21.5		56.3		77.8	
1980	235.0	99.0	76.2	43.8	311.2	300.1
1981	384.2	63.5	75.2	-1.3	1,159.4	272.6
1982	194.5	-49.4	84.0	11.7	278.5	-316.3
1983	157.8	-18.9	89.9	7.0	247.7	-11.1
1984	425.5	169.6	127.8	42.2	553.3	123.4
1985	986.8	131.9	115.9	9.4	1,102.7	99.3
1986	811.3	-17.8	144.2	24.4	955.5	-13.3
1987	1,226.5	51.1	288.9	100.3	1,515.4	58.6
1988	2,242.2	82.8	478.7	65.7	2,720.9	79.5
1989	2,896.5	29.2	586.9	22.6	3,483.4	28.0
1990	3,278.3	13.2	765.4	30.4	4,043.7	15.2
1991	4,667.2	42.4	1,126.0	47.1	5,793.2	43.2
1992	6,287.9	34.7	1,119.0	-0.6	7,406.9	27.9
1993	7,585.4	20.6	1,103.6	-1.6	8689.0	17.3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海關統計處

爲了因應台灣日益密切的經濟關係，以及九七後香港與台海兩岸間特殊而微妙的政經作用，台灣與香港民間的雙邊關係近年來已有增強的趨勢。例如台港雙方的商會組織近年來已有密切的接觸，彼此組團互訪交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及香港總商會已分別成立「台北香港經貿合作委員會」和「香港台北經貿合作委員會」，雙方代表建議台灣加速開放商品市場企業及進一步放寬兩岸三邊的商品貿易，以及建議台灣加速開放金融市場給香港投資者，及放寬在台開設分公司之限制。此外，據非官方統計，迄一九九三年度已有二千餘家台商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較一九九二年的一千三百餘家呈現大幅成長之勢。

除了以上台港雙方經濟關係之增強外，一九九三至九四年間並打破兩地儘量避免進行政治層面接觸的禁忌，多次由香港立法局議員及主要政黨領導人、幹部組團前來台灣觀摩台灣縣市長及省市長、省市議員選舉。而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區代表及香港數個親共教育、傳播界團體及人士亦多次前來台灣訪問」^①。綜合而言，近幾年來台港關係已得到進一步的突破，雙方除加強原有的經貿及金融關係外，民間交流也轉趨頻繁，包括文化、學術、體育等，此外並已伸展至政治層面。顯示台、港之間的互動合作關係，正日趨活絡及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年來中共駐港「中資

註① 中央通訊社，一九九四世界年鑑，台北，民國八十三年，頁八九〇。

」機構等已大量介入港台關係，九七之後，這些政經聯合統戰關係將為港台與兩岸關係帶來新的衝擊。

三、中共與國際因素對九七之後台港關係的影響

(一)中共因素與兩岸關係

1.大陸的政經情勢

如前節表一所示，自從一九七九年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之後，海峽兩岸商品經由香港轉口貿易金額激增，使香港在台海兩岸之間，從一微弱的情報、資訊與政治的中介關係，大幅提升為一重要的經濟與貿易仲介、轉口的要角。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大陸經濟改革的成效與華南及廣東珠江口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由於中共經改後，隨著大陸市場的擴大與開放，以及中共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權明確化後加速對台統戰政策的推動，使得香港逐漸成為兩岸最重要的經濟中介點^⑫。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一九九四年及一九九五年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將分別達百分之十一點五及百分之九，相當突出。至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止，累計外人投資到位金額已超過一千五百多億美元，為世界第二大外資引進國家，約占開發中國家的三分之一。但在其經濟快速成長及龐大資金投入之下，通貨膨脹問題卻持續惡化，並已成為其經濟發展的沉重壓力。預估一九九四年其通貨膨脹率將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未來中共勢必被迫採取更為緊縮的宏觀調控措施，以免經濟成長為通貨膨脹所吞噬。此外並產生貧富差距擴大、地區間發展差距懸殊，都市地區社會秩序惡化、國有企業改革困難及後鄧小平的政權穩定、政治路線鬥爭等問題，均對大陸經濟能否順利發展有一定的影響。這些因素以大陸中共政權一向以政治與政權第一的情形之下，亦有可能產生若干緊縮政策或改變，此端視共黨內部在鄧後的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走向，如有所改變將對港台關係，甚至對香港的政經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

此外，過去無論在轉口貿易或投資上，香港之所以得力於中共一九七九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除了因它在航運、金融及其他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之外，還因為中共初期的改革開放係試點式的以華南經濟圈為重點。但是中共的第二波經改，無論是在廣度或深度上，都強調全面性，這些轉變有可能會對香港未來的兩岸轉口地與台港政經關係，產生若干衝擊^⑬。

一九九一年，中共宣布開發浦東工業區，並企圖將上海發展成為取代香港的國際都市。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宣布加速且擴大改革開放。之後在對外開放上，中共除提出與週邊國家的開發合作計畫，如圖們江開發計畫、西南大陸泰銖經濟圈等

註^⑫ 張榮豐，「香港在台海兩岸經濟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台港關係展望」研討會，台北，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三～四日，頁五～六，另請參閱簡澤源，「香港在台灣海峽經濟交流的中介地位：理論與實證分析」，私立珠海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二四～二五。

註^⑬ 蕭全政：同註^⑫，頁十三～十六。

構想外，更根據「八五計畫」內「全國一盤棋」的國民經濟理念，規劃出東北、華北、長江流域與華南沿海等四大經濟區，試圖在強化國民經濟一體化的同時，利用結合週邊國家與沿海經濟區的國際性開發計畫，引進各國資金、技術及各國際組織的信用貸款，並利用國外市場，大搞「外向型經濟」，以吸納和平演變的壓力，並帶動全面發展。假如全國性的發展是中國大陸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而且長江流域將成為重點，則香港做為大陸轉口貿易與轉運中心的地位將相對受到影響；而上海將有可能會在金融、航運、貿易及其他商業性角色上，在某種程度上取代香港原有的地位與功能。這亦將在若干方面漸漸影響台灣與大陸間的經貿關係，同時影響香港在兩岸間原有的貿易仲介關係。

2. 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

近年來中共一直秉持下列策略與政策，積極對台灣進行統戰，並藉以改善兩岸關係：(1)爭取談判促進統一，為此一目的，「海協會」在兩岸事務性談判中，始終以「一國兩制」為其談判原則，並試圖提升談判層次；繼續採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經促政」、「以通促統」策略，企圖打亂我「國統綱領」的階段進程。(2)調整對象擴大統戰，續持「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要求」，針對我政情變化，爭取具有影響力的政、商界人士、中生代菁英，以及非「獨」的在野派。(3)加強兩岸經貿合作。(4)推動文化、社會、教育等的雙向交流。(5)持續貶抑我國際地位等^⑭。其目的與手段即在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尤其九七之後，中共勢必大舉利用港澳牌，作為「一國兩制」的實證，積極對台進行統戰。一方面除了加速「中資」的擴張，使中資在香港的排名僅次於英國^⑮，於一九九三年底已達二百餘億美元；並加重中資機構對香港工、商、貿易團體的滲透與操縱，以利其控制香港的經濟與對台的經濟統戰。此外，並積極透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各組織，統籌對港台進行新聞、出版、電影、金融、貿易、航運、僑政七大戰略，同時在教育、工會、新界三方面對港進行籠絡、介入與收併工作。這些對港的統戰工作，不但在九七之後會陸續強化，並有可能會透過香港與各地台商，對台進行滲透、合作、交流、慢慢涉入影響島內等工作，對未來兩岸談判與關係造成新的壓力與衝擊。

3. 國際及區域政經因素

如上所述，無論中英聯合聲明或香港基本法，都承認「一國兩制」的架構，將香港視為中共的特別行政區，故儘管香港基本法規定，除國防、外交外，香港具有高度自主權，但恐怕仍然無法完全排除中共的廣泛影響，因為香港的政經權力結構與政治法律體系，仍受中共中央政府制約。

然而由於中國大陸華南沿海地區，尤其廣東珠江口地區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長江流域、華南地區或珠江流域等地區將可能逐漸形成亞太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即使珠江口地區若干港口、城市急速竄起，甚至上海亦可能成為

註⑭ 中央社，同註⑪，頁八二二～八八三。

註⑮ 楊奇編，香港概論，香港，三聯書局，一九九〇年，頁八九～一三五。

長江流域經濟的吞吐口，分散了部分香港的功能與地位。但由於香港地處東南亞陸塊與東亞發達的花綵列島交會之處，也是亞洲陸塊、東亞列島及澳紐等國航運、海運交會重心，加上其既有良好的港口設備、金融、商務、國際都會的基礎，仍有可能繼續成爲亞洲地區性的貿易、航運和金融中心。

最近一項針對全球投資人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仍是他們最喜愛的都市，其排名超過紐約、倫敦與東京^⑩。尤其基於其爲英國殖民地以及與美、日、德及法等大國的特殊經貿關係與經濟利益的相連。例如在香港具經貿利益的美、日、歐及其他國家，在九七後將與香港直接談判並簽訂雙邊協定，以維持其政經利益；又如美國於一九九二年十月通過的「香港政策法案」，其第一百零一條即規定美國應與香港廣泛建立經濟、貿易、金融、財政等雙邊關係並簽署協定。這類協定將制衡中共的干預空間。

因此香港部分民主或自由派人士以及本地企業家，可能利用香港獨特的國際地位，訴諸國際的重視與同情，以爭取本地更多的民主、人權以及經濟社會利益。而香港這些運動的成敗，亦有可能會直、間接有助於國際對台灣政經地位的重估，提升台灣對外的談判地位，並有利於發展台港間的正常關係。

四、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可能衝擊

(一)對香港政經政策及關係的衝擊

以一九九二年我國對美國和香港出口成長率（分別爲百分之二十四和百分之五點六）爲基礎，預計至一九九五年台灣對香港出口將達二百九十三億美元，成爲我國最大出口港，伴隨貿易急速增長而來的人員及資金流通等將更爲頻繁。首先面對的是未來數千家以香港爲第三地區間接赴大陸投資者都將成爲「直接投資」，而對現行間接投資規定造成挑戰。對此，政府宜藉對香港定位的調整，使現有投資方式合理化。

此外，不論是基於繁榮香港、東南沿海的理由，或是爲吸納台灣資源以促進「直接」三通的目的，未來除非有政治上動盪而造成中共對台禁運等問題，否則不論是我方採實質或形式上的間接政策，九七後中共對於台灣人員、資金和貨品的進入，應不致採取禁止進入措施。但各項往來均涉及海空運，特別是涉及領空權的空運方面，假使我方以授權民間單位談判方式進行，中共基於促進三通的目的，可能予以拒絕。事實上，該壓力在一九九五年華航與國泰航空台港航線航約到期後，即將產生，其影響所及是空運、海運、郵電等都須另覓第三地中繼站，或被迫解除間接三通政策防線。此外，即使中共不在航權上刁難，則台灣應如何尋求談判與定位上的調整，以同時兼顧「間接政策」及「維持台港關係」，均是對港政策及兩岸政策上的一大考驗^⑪。

再者，自一九七九年以後，含中共資金的中資機構，如中信、光大等紛紛進入香

註⑩ 中時晚報，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六日，版四。

註⑪ 蔡宏明，「一九九七過渡與台港經貿合作之展望」，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政經形勢與台港關係（下），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頁十六—一~十八—四一。

港，加上原有的中銀、華潤、招商局、中旅社等四大集團，在港中資機構之投資已超過二百億美元^⑮，居外資第二位，且具有組織集團化之特性，在香港的經濟發展與振興縱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預計九七後將成爲香港對台最具政經影響力的機構，特別是在銀行、航空、海運、電訊與公共交通等方面。他們如透過台商與香港的互惠合作的關係，進一步要求在台設立分支機構，進行對台投資與商務，以進一步影響台灣經濟，宜如何因應，亦是政府九七後對港經濟政策的一大考驗。

(二)對台港政治、社會等關係的衝擊

九七之後，台灣必須面對的是香港變成中共一個地方特別行政區的事實，繼之而來的是如何照顧親台的港人，如何保持和香港一定的聯繫，並維持在香港的利益與某種程度的影響力，並保護自己，以免中共透過香港對台灣造成政經乃至社會等方面的傷害與不利。

基本上，九七之後有關台港關係政策是由香港特區政府制定，抑或以全國法律的形式加在基本法附件中實施，現在似乎尚未明確。不過基本法中並沒有任何條文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九七後和台灣或其他地區交往的規定，台灣對此問題宜在港澳關係條例訂定時，以及對港與兩岸談判策略上加以適當因應。

尤其九七後台港兩地區間的關係型態可能由三邊變成雙邊，也有可能由雙邊變三邊。所謂三邊，在九七前指台、港、英；九七後則是台、港、大陸。所謂雙邊即指台、港，但在若干事務上如國防、外交等，也可能是指台灣與大陸。基本上，香港有實際自主權的項目，如經貿、體育交流等，應可維持雙邊關係。但過去英國授權，中共可能不授權的部分，如前述民航契約的交涉等，亦有可能由雙邊變成三邊關係。因爲中共認爲將來台海航線應屬於國內航線，台港航線亦同，依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和一百三十二條規定，這類航線的協定簽訂權在中央人民政府，只是中央可能與特別行政區政府磋商而已。這些雙邊與三邊談判的問題，在未來台港政治經濟等關係上將會造成若干衝擊，宜再加研究，以求因應。

此外，九七之後，香港因爲有高度自治權，它如何在英國最後幾年留下選舉三級議會議員及初期政黨政治發展等既有民主與自治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要求更大的在政治與自治上開放更多的民主政策，這些問題也可能帶來台港間新的矛盾、衝突與合作契機。就民主化而言，無疑的台灣的民主經驗已經普遍引起香港人的討論，兩地民主人士與政黨之間勢必會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以便共同切磋，爲大陸的和平演變而共同努力^⑯。但是怕和平演變的中共卻也勢必會嚴加防範台灣勢力在香港的發展，甚至會因此而調整其台港與兩岸政策。對這些未來的衝擊，亦值得再深入研究以求適當因應。

另外，從台灣角度看，「香港九七」既來之，「一國兩區」的構想宜加以修正。

註⑮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八日，版四。

註⑯ 翁松燃，同註③，頁十二—十三。

兩區若指台灣與大陸，則香港、澳門只能是大陸的一部分，這是不明智的。台灣宜將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視為一個在經濟上擁有準國際人格的地區，將之與大陸地區分開。因此我們似可考慮將「一國兩區」修正為「一國兩府四區」，以便在香港和澳門的特殊地位獲得應有的承認。如此台灣可以一面和中共以平等政府地位交涉，一面和香港建立在經濟上，甚至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合作關係，使台港形成三角關係中的弱勢兩角結盟的情勢，對於三角關係的穩定發展應有好處²⁰。

(三)對大陸政策與關係的衝擊

近年來台灣對大陸的貿易與投資活動成長快速，迄一九九四年五月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比重已達百分之二十，香港已躍居我國第二大出口地區，且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一至七月累計核准對大陸投資金額亦高達三十六億美元，居台灣對外投資總額的首位，顯示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存日益加深。在中共原先已在政治與國際上採取各種敵對態度的情況之下，未來會不會利用吸納香港的模式，擴大台灣經濟對大陸經濟的依賴，並加強利用「一國兩制」及「套、養、殺」的政治策略，同時加重香港與台灣間的關係，以達到其「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經促政」以及「以通促統」的目的，在台灣面臨經濟轉型之際，的確值得注意。

此外，自從新加坡「辜汪會談」之後，兩岸官方便以民間名義，在對等的地位上簽訂協議，也使得兩岸民間交往的管道制度化。中共雖然對「一國兩府」及「一國兩區」口誅筆伐，並且偶而仍會有急於統一的心態，主張儘早進入協商統一的階段。但是由香港納入中國主權實施一國兩制的例子而論，在一國兩制下，欲在政經上吸納香港實尚有一段長路要走，何況對有自己國防、多國外交承認、台海屏障及四、五十年的政經隔離發展，乃至民主與政黨經驗已較成熟定型的台灣而言，實在是談何容易。因此近年來，中共已不過分強調對台統一的急迫性²¹。

基本上，「一國兩制」是先處理統一的體制問題，而台灣發展出來的國統綱領則重視先作功能性合作，再談體制上的融合，而且能不能融合則推到不可知的未來。以Karl Deutsh的理論，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屬於「體制合併」(Amalgamation)，但兩岸關係則是須經過功能整合階段(Functional Integration)。既然「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對台灣毫無吸引力，中共會不會另外發展出其他關係模式，值得進一步觀察²²。

(四)對國內統獨問題的衝擊

根據近四年來有關統獨問題的民意測驗，支持立即台灣獨立以及立即統一者約占百分之十至二十之間，千島湖事件後主張台獨者甚至高達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但綜合而言，支持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統一或獨立者，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然而這次省市

註²⁰ 同註¹⁹，頁十二—一十。

註²¹ 同註²⁰，頁十二—一八。

註²² 同註²¹。

長選舉之後，國內已出現三黨政治的雛形，並在統獨與族群對立方面有被激化的現象。雖然一九九一年國民大會的選舉，以及一九九四年省市長選舉的結果，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似乎漸得到較為冷靜的討論，並也受到若干抑制，主要理由是台灣受到良好教育及生活較為安定富裕的中產階級與新生代選民，並不希望現在訴諸台灣獨立而引起國內及兩岸的政治緊張與對立，甚至有可能陷入社會危機。

然而由於台灣選舉的頻繁，以及在這次省市長選舉與政黨激烈對立，甚至衝突的過程中，不但可以預見族群對立無形中有可能會再激起，有人甚至將「省籍」對立提升至「國籍」的對立，使族群對立與政黨對抗有再被激化的可能。尤其在民進黨的政治支持日漸壯大，國民黨的政治支持加速下滑，以及地下電台、電視台等視聽媒體開放後，已使台獨理念與運動有更大幅度的擴散與發展。在這種情況之下，如前所述，大陸在一國兩制上，以「港人治港」的策略對香港的政治、行政乃至經濟等的干預與滲透、操控，面對國際化的香港，尤其是民主派人士，在九七以前已有深厚的民意基礎，九七之後他們勢必會繼續為港人爭取更多的民主與自治空間。在中共懼怕因香港使得大陸珠江口地區或沿海都市受到影響，必然會產生更多的壓制行為，這些九七後，香港衝擊大陸的因素也有可能鼓舞台灣獨立運動在台的發展，並再激化主張統獨者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另外中共亦有可能在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之後，更加強直接間接對台灣的統戰工作，擴大對台灣施加壓力，強化與台灣發展關係。經由經濟、文化、新聞、教育，甚至政治交流、合作的管道，進行對台的滲透，加強對台工作，並對不同政黨與各界人士進行交流、合作，以加重對台灣政經社會的影響力。這些現象將有可能直接引起台獨勢力的反擊，並激化島內的對立情緒，值得進一步再觀察。

(五)對台灣國防與安全問題的衝擊

由於台灣地區海岸線長，而相對的海防能力卻相當有限，因而造成海上門戶大開、非法活動十分猖獗。而就兩岸關係而言，中共未曾宣布放棄以武力犯台，台灣仍揮不去戰爭的陰影；而兩岸漁事糾紛以及大陸人民偷渡滲透來台，更是為台灣的安定帶來了無限的隱憂。近幾年來，突破我國海岸防線所進行之走私、偷渡、滲透等不法行為，以及各類海事糾紛層出不窮。根據國防部公布之「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及八十三年國防報告書」中指出，累計民國八十一年八月至八十二年六月止，海岸巡防司令部所查獲走私漁船數計四十三艘，私貨價值約新台幣五百三十億元、偷渡人口三千六百六十二名。至於由陸憲警單位所查獲透過海上管道走私之貨品及偷渡之人口更甚於此。在此種情況下，不僅對國內治安造成影響，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甚至危及到國家安全。這在在顯示出台灣海域防衛工作已亮出了警訊，同時也顯示出海防問題已成為國家整體安全體系中主要的隱憂之一。九七之後，香港雖在一國兩制之下有較大的自治空間，但仍不免將被納入中共「國內」統治之內。屆時部分大陸沿海勞工、漁船，甚至已偷渡到香港之勞工及漁船，對台走私、偷渡可能會更為猖獗。尤其如中國大陸出現後鄧的動亂，香港及大陸沿海地區將有可能會出現更大量的偷渡甚至難民潮。台灣應加強海防安全，重新檢討海防安全體系，以確保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安全、安定

與繁榮。

五、結 論

綜合而言，影響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可能衝擊主要受到以下三個因素的影響：(一)香港本身的因素，其中包括：1.香港的政經發展情勢；2.中共香港政策與施政作為的成敗；以及3.九七後香港的對台政策與關係。(二)中共因素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其中包括：1.大陸政經發展情勢；2.中共對台政策的運用，尤其是一國兩制與對台統一政策；3.兩岸關係的互動與發展。(三)國際及區域政經因素。

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可能衝擊約有下列五方面：(一)對台港經濟政策與關係可能造成衝擊；(二)對台港政治、社會等關係可能造成衝擊；(三)對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可能造成衝擊；(四)對國內統獨問題可能造成衝擊；(五)對台灣國防與安全可能造成若干衝擊。

本文其他主要發現如下：

(一)香港中資機構九七之後將可能成為香港對台最具政經影響力的機構，他們可能會透過台商及在台相對組織進行互惠合作，並進一步要求在台設立分支機構，進而影響台灣政治與經濟。

(二)九七後，台灣必須面對的是香港變成中共一個地方特別行政區的事實，繼之而來的是如何照顧親台的港人，如何保持和香港一定的聯繫，維持在香港的利益與某種程度的影響力，並保護自己，以免中共透過香港對台灣造成政經乃至社會等方面的傷害與不利。

(三)九七後台港兩地區間的關係型態可能由三邊變成雙邊，也有可能由雙邊變三邊。這些雙邊與三邊談判的問題，在未來台港政治、經濟等關係上，將會造成若干衝擊，宜加以研究，以求因應。

(四)我們似可考慮將「一國兩區」修正為「一國兩府四區」，以便使香港和澳門的特殊地位獲得應有的承認。如此台灣可以一面嘗試和中共以平等政府地位交涉，一面和香港建立在經濟上，甚至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合作關係，使台港形成三角關係中的弱勢兩角結盟的情勢，對於三角關係的穩定發展應有好處。

(五)「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對台灣已無吸引力，中共會不會發展出其他關係模式，值得進一步觀察。

(六)為因應九七後以及大陸後鄧時期可能帶來的變局，台灣應加強海防安全，重新檢討海防安全體系，以確保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安定、繁榮與安全。